

## 杨筹墓志所见晚唐精英仕宦策略的身后表达

刘后滨

(提纲)

2011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曲江繆家寨村发掘清理了杨筹墓，出土了墓志铭。《文物》杂志2016年第7期发表了简报和张小丽的考释文章，文章对于墓志的释读错误较多，尤其对于杨筹入仕途径与仕宦经历的解读，尤有误解。杨筹家族成员的墓志多有出土，相关研究也积累甚多。如王静《靖恭杨家——唐中后期长安官僚家族之个案研究》（《唐研究》第十一卷）、许友根《唐代杨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科举选官制度，杨筹墓志可以发掘出更多的历史信息。

杨筹之祖父杨宁，元和年间任国子祭酒。据杨宁墓志，宁元和十二年（817）卒，享年74岁，其生年在天宝三载（744）。墓志称“既冠，擢明经上第”，又称“公故张出，季舅参大历间尝贰口成，通儒硕德，推高宇内。洎公之拜，论者荣之”。知杨家最初以经学起家。而到元和以后，杨筹之父杨汉公及汉公之兄弟杨汝士、杨虞卿、杨鲁士等皆以进士及第，杨汝士还曾知贡举，在元和至大和年间的科举考试中具有超强的话语权。元和九年韦贯之知贡举，已落重收的殷尧藩就是在杨汉公的推荐下再次录取的。杨氏家族从明经到进士举业选择的转变及其家族政治社会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贞元元和之际唐代政治社会变革的重要体现。

杨筹墓志记载，“其后始学，经明，一试中选，思大炽其业。一日得左丘明书、孔氏易，考磨钻练，俾欲尽囊胸中而不暂顾息。一旦被病且薰，弥岁乃解，而前志益张。大中初，方从文科荐，却关清处如平居时，淬琢词章，恪膺公限，未尝轻作豪秀，争得失于向背间。故五试方籍于春官氏，时大中五年也”。说明其始以明经及第，但并不满足于以此进入仕途，而是不断参加进士科考试，五试后方得及第。这是杨氏家族在杨汝士、杨汉公一辈进士举业辉煌之后的仕宦选择。而杨筹应进士举之执着及其艰难，也说明杨氏家族在晚唐的某种衰落。杨筹尽管历经曲折才进士及第，且其及第后年岁已大，但他此后的仕宦出处却也是一种有意的选择，大体符合贞元元和以来所谓“宦途八俊”的仕宦途径。而且，墓志中对其仕宦选择的叙述，是一种典型的身后书写，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价值取向。

杨筹明经及第之后还要参加进士科考试，这在中晚唐时期是精英家族采取的一种较为普遍的仕宦策略。徐松《登科记考·凡例》说：“大抵第明经者，仍得举进士，牛蔚、王凝是也。第进士者，亦得举明经，蔡京、许孟容是也。”

惟进士得第则止，明经有再试之法。”蔡京、许孟容之例不确，但明经及第者再举进士却是事实。牛蔚是晚唐名相牛僧孺子，“十五应两经举。太和九年，复登进士第。三府辟署为从事，入朝为监察御史”<sup>1</sup>。“少擢两经，又第进士，繇监察御史为右补阙”<sup>2</sup>。王凝，少孤，宰相郑肃之甥，少依舅氏。年十五，两经擢第。尝著《京城六岗铭》，为文士所称。再登进士甲科。崔瓘领盐铁，辟为巡官。历佐梓潼、宣歙使幕。宰相崔龟从奏为鄆县尉、集贤校理，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宰相崔铉出镇扬州，奏为节度副使。入为起居郎，历礼部、兵部、考功三员外。迁司封郎中、长安令。中丞郑处海奏知台杂，换考功郎中，迁中书舍人。时政不协，出为同州刺史，赐金紫。暮年，移疾华州敷水别墅。逾年，以礼部侍郎征。官至河南尹、检校礼部尚书、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sup>3</sup>

本文的初步结论是，唐代的旧门与新贵充分利用当时的举选制度和官僚体制，在其仕宦途径的选择中塑造了其时的政治文化，并反过来影响到举选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发展进程。

---

<sup>1</sup> 《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附牛蔚传》。

<sup>2</sup> 《新唐书》卷一七四《牛僧孺传附牛蔚传》。

<sup>3</sup> 《旧唐书》卷一六五《王正雅传附族孙王凝传》。